



责任编辑:李绍坤 美术编辑:姜贝 电话:0595-22500091 传真:0595-22500225 E-mail:zkb@qzwb.com

明代泉州名士重视经略海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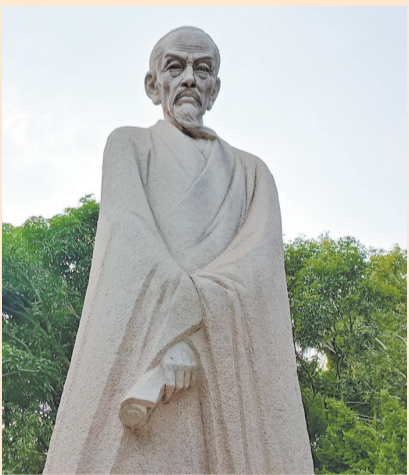
明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,朝廷长期实行“海禁”政策。然而,西方殖民主义者来自海上的威胁,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,使得海洋问题日趋复杂。泉州自古以来海外交通发达,宋元时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贸易大港,也是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和世界人民友好往来的重要门户,对明代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。泉州世家代表人物关注海洋,对海禁、海商、外国传教士来华、海防建设等有关海洋意识的问题,发表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有益见解。



抗倭英雄俞大猷长期致力于强化海防建设,图为俞大猷画像。



明末大学士史继偕也是“开洋”的支持者,图为晋江龙泉书院内的史继偕铜像。



屹立于泉州西湖公园内的李贽塑像



何乔远曾在清源山开辟镜山书院,他一直积极肯定商人勇闯八方的精神,今在清源山下尚有镜山书院遗址。



名士李光缙赞扬“行贾间之有贤人”,《景壁集》是李光缙的重要著述。



大学士黄景昉曾为艾儒略《三山论学记》作序,在黄氏家庙内悬有纪念黄景昉的“官保宰相”匾额。

力主开放海禁 与海外诸国互通有无

朱元璋建立明朝后,为了孤立盘踞在沿海岛屿上的元朝残余势力,实施“海禁”,严禁沿海人民与海外往来。洪武四年(1371年),宣布“濒海民不得私出海”、不得“私通海外诸国”的禁令。洪武二十七年(1394年)下令“禁民间用番香番货”“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,必置之重法。”海禁不仅使民间海外贸易受挫,官方贸易也受到限制。

永乐年间,海禁有所松弛,出现郑和下西洋的海外贸易活动,私人海外贸易有所发展。嘉靖二年(1523年),发生日本贡使“争贡之役”,嘉靖皇帝再次重申海禁,使私人海外贸易受到遏制。隆庆二年(1568年),明穆宗宣布部分开放海禁,“准贩东西二洋”,海外贸易迅速发展。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,崇祯皇帝重申海禁,遭到臣民的反对,不久放宽海禁。

在明代反海禁斗争中,泉州世家代表人物站在海商的立场,反对海禁。崇祯二年(1629年)又实行海禁,南京工部右侍郎、泉州人何乔远撰《海上小议》。三年撰《开洋海议》《请开海禁疏》,主张开海禁,认为“闽地窄狭,田畴不广,又无水道可通舟楫,上吴越间为商贾。止有贩海一路,可以资生。”指出海禁断海商之民生路,迫使入海为盗,“然海滨民众多生理无路,兼以天时早涝不常,饥馑流臻,有司不能安抚存恤,致其穷苦益甚,入海从盗。”认为开海可以增加国库收入,云“至万历初年,始开洋税于漳州海澄县,其时收税共得十三万余金,人民安乐,军饷饶足。”还可以与海外诸国互通有无,大西洋暹罗、柬埔寨诸国“产苏木、胡椒、犀角、象齿、沉檀、片脑诸货物,是皆我中国所需。”东洋吕宋“有银山出银,夷人铸铸钱,独盛我中国。”

史继阶、张瑞图也主张开洋。崇祯六年,福建巡按路振飞在《按闽摘略》中云:“据泉州乡官史继阶、张瑞图等称,开洋有四便,漳州乡官林宰等称,海寇起灭,不系洋禁开闭……衣食源开,则利在民;洋税复而闽安诸税可免,则利在商;得税三四万以壮军,实则利在准备。”邓钟在《论海市》中云:“福建阻山负海,旁旅病于跋涉,民多贩海为生,禁之太严,奸民势穷必至为盗。自纳餉过洋之例开,豪猾之徒咸趋利而畏法,故海澄之开禁,凡以除中国之害也。然开海禁于为无弊者,在中国往诸夷,而诸夷不得入中国也。”对海澄开海禁予以积极的评价。

支持商人从事海外贸易 肯定拼搏精神

明代泉州世家的代表人物李贽、何乔远、李光缙、王慎中等人同情商人,肯定商人的地位和拼搏精神,赞扬商人的才干、经商本领和拾金不昧精神,体现他们的重商精神。

李贽同情商人,云:“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?挟数万之货,经风涛之险、受辱于关吏,忍诟于市易,辛勤万状,所挟者重,所得者末。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,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,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!”对商人受关吏、市易盘剥的处境深表同情。李贽赞扬商人的才干,谓:“今子但见世人挟其诈人者,唾手即可立致,便谓富贵可求,不知天与以致富之才,又借以致富之势,畀以强忍之力,赋以趋时之识,如陶朱、骑顿鞮、程郑、卓王孙辈,亦于与之以富厚之资也。”李贽以致产致富的陶朱公范蠡等人为

例,赞扬商人努力拼搏奋斗而致富。

李光缙赞扬“行贾间之有贤人”。赞扬安平商人的经商本领,从小贾,进而成为中贾、大贾。在为其族兄寓西寿序云:“安平人多行贾周流四方,兄伯年十二,遂从入入粵。勤有诚壹辐辏之术,粵人贾者附之纤赢薄货,用是致货,时为下贾,已徙南澳,与夷人市,能夷言,收息倍于他氏,以至益饶为中贾。吕宋澳开,募中国入市,鲜应者,兄伯遂身之大海外而趋利,其后安平效之为上贾。”赞扬安平商人善于用智慧经商,懂得“倾货于士,设财役贫”。

何乔远肯定安平商人勇闯八方的精神,他说:“安平一镇尽海头,经商行贾力于徽歛,入海而贸夷,差强费用。”何乔远在《名山藏》中为商人立传,体现他的重商思想。

积极与西方人士交游 吸纳先进知识

泉州文化具有多元文化的特质,即代表大陆文化的汉文化(中原文化)与代表海洋文化的闽越文化并存。在宗教方面体现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并存,对不同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,各种宗教和平共处。宋元时期,泉州海外交通发达,中外人民往来和文化交流频繁。受此影响,明清时期,泉州士大夫思想开放,积极与外国传教士交游。

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(号西泰),万历十年(1582年)来华,初抵澳门,后入居广东肇庆和韶州。与他交游的有韶州知府、晋江人谢台卿,韶州府推官、南安人黄华秀。万历二十七年(1599年)夏,利玛窦在南京两次和李贽相见,并把他的《交友论》送给李贽。李贽送利玛窦折扇,并题诗二首,现仅存《赠利西泰》一首:“迢迢北溟,迢迢南征。利利标名姓,仙山纪水程。回头十万里,举目九重城。观国之光未?中天日正明。”李贽在《与友人书》中对利玛窦的音韵学研究给予很高的评价:“凡我书籍无不读,请先辈与订音释,请明于《四书》性理者解其大义,又请明于《六经》疏义者通其解。”说明中西学者互相切磋音韵学。

万历二十八年(1600年),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与利玛窦沿运河北上晋京,行至山东济宁,李贽在济宁漕署,热情接待他们一行。晋江人陈亮采为庞迪我《七克》作序。

在北京与利玛窦交游的泉州士大夫有张瑞图,在《赠西泰思及艾先生诗》中云:“昔我游京师,曾逢西泰氏。贻我十篇书……取出再三读,低徊抽服旨。始知十篇中,篇篇皆妙理。”

杨道宾在南京时认识利玛窦,在北京时成为利玛窦的最好朋友之一。张维权为利玛窦写传记《大西西泰利子传》。张震也在北京与利玛窦交游。黄景昉《国史唯疑》中记载利

玛窦,“利玛窦从天津来,大监马堂解进京,为礼部所取……今其徒遂遍中外,非苟然者,所传天学格致学,亦特精辨。”

另一个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,在闽25年,泉州士大夫与他交游的很多,写诗赠送他的有何乔远、张瑞图、林欲樾、庄际昌、周廷鑑、林维达、郭焜、方向来(永春人)、林焯(德化人)等。如何乔远诗云:“维此艾公学,千古入吻舌。吾喜得斯人,可明人世目。顾虽兼行持,蓬庐但一宿。善哉艾公警,各自返茅屋。临岐申赠辞,证明在会续。”回忆与艾儒略一夜之交谈。此外,何乔远曾为艾儒略《西学凡》作序,黄景昉、苏茂相曾为艾儒略《三山论学记》作序,张震为艾儒略《五十言录》、孟德望《天学略义》、龙华民《圣若撒法行实》校订和作序。与艾儒略交游的泉州士大夫还有黄文昭、林维造、李世英、郑之铭、许日升等。

何乔远在北京与明末来华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龙华民也有接触。何乔远《真奇图序》云:“见其所藏先世至人之书,皆旁行手书,亡虑数百卷。”龙华民家有地球仪、望远镜、钢琴等物,还有宋薛尚功手书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》(即《真奇图》)。明廷曾向西洋人学习火器、火药。龙华民率其于广东香山的西洋人24人到北京传授火器知识。何乔远肯定西洋火器,“火攻之器械最良,铸之制造西洋国最良,发统之法西洋国之人又最良。”明末大学士蒋德璟肯定西方天文仪器的先进性,“向与西士游,第知其历法与天地球、日圭、星圭诸器以为工。”

崇祯十年(1637年),晋江景教堂刻印艾儒略撰、蒋德璟校、米嘉穗序《西方答问》。该书是艾儒略与福建士大夫的对话,交流探讨有关天文、地理、政治、经济、饮食、医药、婚姻、人情、丧服等方面的问题。

重视海防问题 提出保卫海疆策略

15世纪以后,随着新航路的开通和地理大发现,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、英国等殖民者东来,掠夺财富,给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。加之倭寇对东南沿海的侵扰,使人民生活和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。为捍卫民土,泉州士大夫提出加强海防的对策。抗倭英雄俞大猷认为,强化海防建设是防止外患的当务之急。他说:“窃虑防倭征调陆兵,已尽天下之选,卒未见奇效。若用陆兵所费之半而用于海,则倭患可以渐息。”主张加强水师,建立一支既善海战又善陆战的部队,以捍卫海疆的安宁;提出御海洋、御海岸、御内河、御城镇的防御战略。明代海防防御系统有水寨、巡检司和卫所。水寨设于外洋,巡检司为地方官员指挥的地方武装,卫所是中央派兵镇守的军事重镇。俞大猷提出充实这三个系统的实力,使它在保卫海疆中发挥主导作用。他还提出以海舟制敌,“倭贼之来必由海,海舟防之于海,其首务也。”倭寇由河港进入内地抢掠,防御的办法是募造船只,分泊于各港,以防贼舟之深入。在沿海屯扎陆兵,防贼登岸。固守沿海城镇,使敌不得内侵。利用渔船在海面上御倭,“听其来捕,因而为兵。”俞大猷强调军队要常练、精练、熟练的治军方针。他说:“有兵不练与无兵同,精兵不练与弱兵同,练兵不熟与不练同,驱不练之兵以与贼从事,此则万战而万北。”他以此训练出一支英勇善战的“俞家军”。俞大猷《舟师》表现俞大猷忠心报国、保卫海疆的伟大思想,诗云:“倚剑东溟势独雄,扶桑今在指挥中。岛头云雾须臾净,天外旂旗上下冲。烽火光摇汉影,歌声气压虬龙宫。夕阳景里归篷近,背水陈奇战士功。”

名将沈有容在泉州抗击倭寇和荷兰的侵扰,功勋卓著。泉州士大夫何乔远、郭惟贤、黄凤翔、陈学伊、李光缙、黄克缙、林云程、詹仰庇、苏茂相、池浴德等,与之交游,且有赠言,合刻为《闽海赠义》,对沈有容率师“飞扫东番倭穴,谕却红毛夷”给予高度评价,反映他们对海防问题的关注。

蒋德璟《策海》一文对海疆形势提出对策。邓钟在胡宗宪《筹海图编》的基础上,重辑《筹海重编》,对沿海形势进行分析,提出开海通商与巩固海防相结合的主张。安海人黄堪《海患思》,提出加强海防,保卫安海平安的对策云:“石井、东石二乡,千有余家,分据海岸,势如交牙,以渔为生,颇谙水斗,实为安海诸乡之捍门。”乞赐申请设官永镇,使地方有备,则盗寇无窥伺心;政令中严,则奸顽无交接之患。地方安靖,民生乐业,实为万代阴福。”反映出文人也重视海防建设。

综上所述,明代泉州世家代表人物站在海商的立场,反对海禁,认为开海可杜绝沿海渔民入海为盗,可增加国库收入,可与海外诸国互通有无,对国家、人民都有利。他们同情并赞许商人,鼓励海商走出去,为家族为社会而拼搏。另外,泉州士子也积极与外国传教士交游,肯定西洋火器、天文科学的先进性,提出加强海防的对策等,这些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行为。

(李玉昆/图 吴擎云/图)



明末大学士蒋德璟出生在晋江福全古城内,学识渊博的他,肯定当时西方天文仪器的先进性。图为福全古城。